

清末小說 與社會政治變遷

(1895~1911)

賴芳伶 著



大安出版社 印行

清末小說 與社會政治變遷

(1895~1911)

賴芳伶 著

ISBN 957-9233-52-7



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
(1895 ~ 1911)

賴 芳 伶 著

大安出版社印行

本書簡介

本書論析清末小說與當時政治、社會各層面間的回應關涉，及其變遷過程。取材除四大譴責小說外，盡可能旁及相關作品，並嘗試結合史學、文學、心理學、民俗學與小說社會學等研究方法，以期詳窺清末求變、過渡的時代特質。

作者賴芳伶女士，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教於國立中興大學。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 (1895-1911)

著者：賴芳伶
發行人：蕭淑卿
發行所：大安出版社
電話：三六七九〇四二
傳真：三六七二四九九
辦事處：臺北市汀州路3段151號2樓
郵撥帳戶：一〇一〇三八七七
大安出版社
印刷者：崇實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三和路4段89巷4號
電話：二八七六五二二
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第一刷 0001~5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四八〇元

總經銷：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戶：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〇二)二三六三五一五六
傳真：(〇二)二三六三三三四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9233-52-7

Abstract

The convulsions in the sixteen years from 1895 to 1911 marked the center of a change China had not seen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Never before had there been so many social, governmental, diplomatic, economic,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ideological stimulations and evolutions. Literature not only mirrors social processes, but itself could be viewed as a refined essence of society in miniature, and summary of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ange. No society can undergo complex changes without a substantive and special response from literature that deserts a cross section of the times and from it burst forth a deep concern for humanistic manifestations.

Novel-fiction is no exception, being part of literatu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ovel-fiction and history is the result of personal testament to culture and thus a product of the times. Although in reality life had been dissected and welded back together again, while in novels events had been refined and restructured by authors, the deeper meaning in the sense of time and history is not only true to reality,

but actually strengthened.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studies of late Qing novels in recent years, yet the trend appears to emphasize the four "denunciatory" novels. Actually, since the focu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studies differ, many hitherto unnoticed works need to be reviewed and understood for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artistic value.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esent a critique of late Qing novels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ons and reverber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sectors at the time, and to map their evolution, the present study is not limited to the four novels, but is expanded to include related works. New research methods will also be sought to steer away from bias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a narrow selection of writings.

The Chia-Wa Sino-Japanese Conflict (1894~1895) marked the turning point that brought together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fresh ideas from European, American and Japanese sources into Qing society. Diverse ideas generate forces that spawned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pushing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overthrew the Qing government at the end of the

dynasty. Therefore, upheavals in culture and society form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ramework of novels. Many late Qing patriots in search of ways to save the country from ruin often used novel-fiction as an effective tool to battle illiteracy and to enlighten the society. Beginning around 1895, Yen Fu, Liang Chi-Chao and others continually promoted the literary standing of novels to establish their social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A spate of novels of different styles were written and translated at that time, a landmark in literary history that also had strong social implications. For these reasons, 1895 is select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thesis. In addition, it also represents new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thorough awakening of China from its misery and its haste to modernize and to enter the world arena.

Follow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t stands for a 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rive for the country's future. Changes in novel-fi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closely match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ulse of the time. Although novels which were popular in the beginning years of the Republic, can be considered an extension of the late Qing novel, characteristics of a new stage are

quite obviou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kes 1911 the end point of its analysi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at novel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employed literary language to depict concrete cultural and social phenomena. The sociopolitical changes reverberating and refracting from their depths often stimulate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giving them a sense of "being there". The interacting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whether from the works or from the times, generate rather deep and meaningful study.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dissections, we are able to examine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from there rethink politics, society, history, and artistic appreciation within the realm of humanistic studies, thus fulfilling the functions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目 錄

緒論	1
第一章 清末小說發展的歷史背景	13
第一節 列強的侵略	13
第二節 西洋文化的輸入	16
第三節 開民智運動	21
第四節 改革派與革命派的論爭	25
第五節 都市化與新聞事業的興起	28
第二章 清末小說的誕生	35
第一節 小說在文學中地位的轉變	35
第二節 小說界革命	54
第三節 域外小說的引進	67
第四節 小說作者群和讀者群的形成擴大	85
第五節 清末小說的主要溫床——四大小說期刊	89
第三章 新思潮與舊觀念的融匯	99
第一節 進化論的引入	108
第二節 民權思想的提倡	118
第三節 虛無主義的援引	140

第四節 女權思想的催生	161
第四章 清末小說對官場與民間衆生相的揭露批判	189
第一節 抨擊科舉與捐納制度	190
第二節 譴責腐敗的官場	216
第三節 批判媚外與排外	250
第四節 廓清「鄙風陋俗」	278
第五節 嘲諷虛妄世情	308
第五章 清末小說與重大社會政治事件的對應含納	329
第一節 甲午之役的悲憤哀慟	341
第二節 戊戌維新的興發與破滅	359
第三節 庚子事變的挫辱省思	385
第四節 抵制中美工約風潮始末	420
第五節 立憲運動與排漢革命的分合轉化	449
結論	499
主要參考及徵引書目	507

緒論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七、八十年間，是近代中國面臨西潮衝擊、傳統崩潰、同時也是開始步入現代化的時刻。自一八六〇年代的洋務自強，至一八九〇年代的維新變法，重點目標實在於救亡。早在光緒前期已有不少先覺之士，了悟到光是技術器物層面的改變是不夠的，恐怕還要進一步在政制、教育上革新^①。迨中日甲午之役慘敗，《馬關條約》簽訂，尤成為此一徹底認識的轉變關鍵。康有為(1855～1905)在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一八九五)〈上清帝第二書〉中說，「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砲械軍器，而在窮理致學」^②，明顯透出其中的訊息。這個「學」，已逐漸從傳統的學問轉變為近代的「西學」。

於此稍前兩個月，嚴復(1852～1921)在天津《直報》上發表〈原強〉一文，曾援引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社會有機體」(Social organism)的理論，來重新審視中國的問題。他認為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整體，其功能、發展，與個人的素質有密切的關係，故強調中國當前的困境，不僅在於「收大權、練軍實」的策略運用，尤其要注意及民智、民力和民德的問題。事實上，自海禁大開以來，中國所引進的西法，不可謂不多。這些西法都是「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強之機」，但到了中國，何以「遷地弗良，若亡若存」？嚴復指出，是因為「民智既不足以與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舉其事故也」。同樣的意思，嚴復又在〈原強

修訂稿〉中加以引申，正式標舉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主張。^③

再看梁啟超(1873~1929)於一八九六年的《時務報》上刊載《變法通議》，疾呼「變科舉、興學校」，並力倡「自上先變，自下覺悟」以興民權。^④他的卓見復匯集其師友的觀念，透過光緒促生百日維新。至變法受阻失敗，尤覺識到開民智之不可或緩，乃陸續呼籲社會以小說戲曲啓蒙大眾。亡命海外的維新分子與革命派，於言論和實踐上，分合互動、裡外奧援，呼應鉅變的時局，終而激生了辛亥革命，結束清廷的統治。

此期間，列強勢力逐步由蠶食而鯨吞，復糾葛清廷權力集團的爭鬥，而衍生義和團拳變、八國聯軍的入京，與《辛丑和約》的訂立，幾乎招致亡國慘劇。凡此種種，更環扣相生了唐才常(1867~1900)的自立軍之役，分贓不均而起的日俄戰爭、抵制華工禁約的風潮，以及要求立憲、國會請願、收回路礦利權運動……等狂風怒雨的政治、社會動盪。

從一八九五~一九一一年間的鉅變，可謂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⑤中的焦點，舉凡社會、政治、外交、經濟、文化、教育、思想……各層面的流轉激化，都幾達空前。基本上，文學不只是社會過程的一種反映，而且是從中提煉出來的精髓，並成為整個歷史的縮影和摘要^⑥。漢學家常從《詩經》、《楚辭》……等文學材料去參證中國古代的社會現象，即是此理。幾乎沒有一個社會不經歷繁複的變化過程，文學作品能夠對社會生發具體特殊的反應，剖示某個時代的橫切面，並由此激發出人文現象的深切關懷。「進一步說，文學模仿人生；而人生，便是社會的現實。」^⑦

小說既是文學中的一部門，當然也不例外，但有時不免會涉及

小說的可信度，以及其中情節如何化約 (reduced to) 為社會史料的問題。如果於此先有所釐清，將對本論文的主題衍述，有不少幫助。

就小說的本質言，一般論者大都認為小說必須具備相當的長度、結構、章回、人物、敘述人、寫實精神等要素。西方或就長短、寫實與虛構之類的特點，來區分“Novel”和“Fiction”。在中國「小說」一詞的含義極廣，惟早期常於其上加附「筆記」、「志怪」、「話本」、「傳奇」或「文言」、「白話」、「講史」、「公案」……，以示同中有異；到晚清，又有所謂的「政治小說」、「寫情小說」、「社會小說」……的類別出現。儘管東西方在小說基項的內涵上互有出入，但原則上，雙方小說的發展，仍不外乎循此若干基項。^⑧

從傳統看，小說作者的見解，常有異於官方的看法，多屬於市井階層的文學特質。要是將小說看成是完整無缺的有機體，或是社會現實的忠誠反映，似乎都不恰當。因為小說未必全附庸於外在的現實，但也不是與外界絕緣，而自足於內的唯心主體，反倒是介乎二者間的游移體。其意識型態不一定盲從道統，可也不至於全盤否定固有價值，往往順從與異議參半。

前人曾有不少關於小說與實錄（包含歷史、時事）之間，究竟有何等關連的討論，有人主張實錄異於小說，小說的功用即在普及歷史，因為歷史「義微而旨深」，以小說的淺顯易解，正可「裨益風教」^⑨，這種看法把小說拿來補充史料的記載，等於是歷史的支流。^⑩也有的認為，小說雖不妨用來宣揚歷史，但它的特色實在求奇、求幻，有別於實錄的求正、求真^⑪，即使不必完全受限於史實，也不好一味虛構，最好是虛實相輔、奇正相生。還有人覺得，能夠

同時把虛實兩面並陳於讀者面前的小說，堪與歷代經典並列^⑫。由於現象世界有兩面，常相為表裡；文章也有兩面，以互通有無。二元之間可藉相互補襯而達統一。此種補襯，即為「中介」。^⑬

從中介的角度講，小說與歷史情勢互動，是社會文化與個人辯證關係的成果，亦即是時代的產品。小說有極可貴的功能，不只能夠傳述歷史所不能傳述的細微事物，尚且能藉由作者精妙的想像，「把散見於社會中的某些現象，凝縮成小說中的情節。……人生中的某些現象與生活，不僅可以凝縮、集中，並且只有加以凝縮集中後，其本來的特性，其本來的意味，始能較完整地表現出來，始能為人所接受。……這是文學家通過創造的心靈，所創造出「原始資料」無法表現得出來的真實。」^⑭而這就是所謂「藝術的真實」。因此，小說雖然經過作家對生活的剪裁、鑄鑄，對時代事件的提煉、重組，但就深層次而言，不但無損於真實，反而更加強化其時代性與社會性。^⑮

如果暫時撇開小說的消遣性質不談，就其材料善加利用，確實可以篩選出不少的社會史料。即以晚清小說論，不管是「真實」或「渲染」的部分，都含攝了當時社會的多層多重面貌，作家有意識的創作宗旨，尤其回應了時代的眾聲喧嘩^⑯。舉凡列強隨傳教、通商而至的經濟、武力侵略，中國門戶洞開後，西方文化思想湧入所引起的新知識分子取代舊士紳，從政治維新到排滿革命的轉化，啓迪民智與振興女權的呼籲，沿海口岸都市化和印刷新聞事業的蓬勃發達，演說示威、罷課罷工等多樣民間抗議活動，以及文學思潮的省舊開新……等，幾乎無不經由小說與社會的互動而呈顯出來。

近一、二十年來對晚清小說的研究非常蓬勃，或考據索隱、或就文史的角度發明立說，皆不乏獨到之處，然常有偏重四大「譴責

小說」的趨勢。^{①⑦}實際上，往往因研究焦點和角度的不同，有不少不受注意的作品，在時代意義與藝術價值上有重新審視和瞭解的必要。如洋溢重商思想的《市聲》，強烈反思庚子拳變的《劍腥錄》、《救劫傳》，力倡革命排滿的《洪秀全演義》，倡導女權意識的《黃繡球》，宣言政治改革理想的《新中國未來記》……等，要是把它們放進整體的社會史觀裡，在價值上恐未必遜色於譴責小說。尤其譴責小說強烈的批判，如無建設性的政治理念的宣導，恐只能流於片面的消極無奈；若缺少暗殺、劇烈的革命行動的配合，也難以突顯晚清求新求變的時代特質。所以，為了更合理論析晚清小說與當時政治、社會各層面間的回應關涉，及其變遷過程，我希望不只以四本譴責小說為對象，且能旁及相關作品^{①⑧}，並尋找新的研究方法^{①⑨}，以期從有限偏狹的史觀和文獻中走出來。

由於中國社會橫切面的遼闊，加上在外力侵蝕下各部分反應程度的不同，故不可能盡舉晚清散佈在該社會層面上所有類型的社會現象來論述。尤其透過一八九五～一九一一年的小說所涉及當時的社會政治變遷，在地理上只散佈於中國社會中的少數點上，亦即沿海和沿江的城市，及少數內陸的大都市中；人口似只限於少數的知識分子^{②①}、開明或保守的士紳、政府官僚、和工商界人士。其餘大部分人中，有的雖參與變化，但多少是不自覺的、被動的，甚至有的根本未參與變化；於政治制度方面，少數的中央政制及大部分省級以下的政制可說原樣未動；還有，在社會理念（包括上流與下流的道德、信仰、習俗）、規範上，對個人行為的制約仍極具勢力。凡此種種，都是本論文在進入研討之前必須先強調的。

細考中國近代小說的發展，甲午之前與之後，特色截然不同。鴉片戰爭至甲午之役期間的小說，被學者劃分為近代小說的第一期

⑪，數量雖不少，但多屬於「俠義小說」、「公案小說」和「狹邪小說」之類，思想偏向保守，承襲傳統舊小說的餘緒；與甲午戰後以反映時弊、開通民智，和改良社會為宗旨的「新小說」，在革新意義上相去甚遠。小說理論方面亦然。甲午一役，不特是政治外交上的鉅創，標志出前此洋務自強運動偏向器械科技的缺失，同時也是晚清社會蓬興歐美日本自然科學、哲學、法制與人文新思潮的轉捩點，諸種思潮相互激盪辯證，復衍為清末維新立憲與排滿革命的兩大政治運動。而其間思潮與政治社會之轉折歷程，適足以相互參證小說內外承的傳承演變。晚清許多愛國志士，在尋找救國保種、振興圖強之路時，常強調開民智，並以小說（戲曲）為啓蒙社會的有效工具。約自一八九五年起，嚴復、梁啟超等人，即不斷有意提升小說的文學地位，肯定它的社教功能。梁氏更於一九〇二年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呼籲，其〈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尤為一綱領性的經典之作，各類不同風貌的小說創作與翻譯，一時風起雲湧，不僅在文學史上是空前之舉，復兼具強烈的社會意義。因此，本論文選擇一八九五年為起點，除上述用意外，也因其為近代中國徹底自痛苦中覺悟，急欲邁向現代化、進入世界性角色的新契機。

論者指出，甲午敗戰的刺激，使西方新思潮的流佈更加急速，緊接而至的變法失敗、庚子拳變與八國聯軍，尤其重挫民心，清廷雖被迫勉強從事有限的改革，然已難挽大勢，在內憂外患迭相煎逼下，反加速本身的崩潰，終於在改革派與革命派相反相成力量的匯流下，爆發了辛亥革命。中國舊有的專制政體，形式上被新建立的民主共和所取代，雖然有人以為此舉只是改朝換代(dynastic cycle)而已⑫，往後的奪權政爭依舊不已，然而，就某種意義上看，實已代表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家國出路的一個暫時歸結。此期

小說方面的演變，亦緊扣政治、社會的脈搏，清末十數年，除一直流行於社會的言情、偵探小說外，前半期繁盛的政治小說，到末期已不大為人提及，迨至民初，又出現一大批立意娛人自娛的作品。雖然民初繼起盛行的鴛鴦黑幕小說，及往後五四感時憂國的文學精神，與晚清小說實有內外在承傳的因緣，但已別具新階段的特質，故本論文擬以一九一一年為研究迄點。

現將各章重點略述於下：

第一章：宏觀晚清小說發展的歷史背景。從列強的侵略、西方文化的東來、新知識分子的出現、政治維新與排滿革命的論爭、開民智運動、都市化與印刷新聞事業的勃興等歷史動向^②，闡明晚清小說出現的因緣。

第二章：以「晚清小說界革命」為焦點，尋繹出當時的文學潮流與政治、社會情境之互動，所以造成小說風行的理由。此章係採微觀角度探究，故與第一章有所不同。

第三章：新思潮與舊觀念的對立、融匯。就晚清知識界倡導進化論、民權學說、虛無主義與女權思想等外來新思潮切入，以觀照晚清政治社會求新求變的理論依據，同時藉當時小說為例，闡述新舊變遷過程頡頏、交會的緣由與意義。

第四章：論析晚清小說對官場與民間眾生相的呈現、批判。包括反對科舉、捐納制度，揭露腐敗吏治，怒譴朝野之媚外排外，並於「鄙風陋俗」之廓清，與虛妄世情之嘲諷。

第五章：剖述晚清小說與當時重大政治社會運動的對應含納，涵蓋甲午之役的悲憤、戊戌變法的興發破滅、庚子事變的挫辱省思、反華工禁約的商戰浪潮，以及君主立憲與排滿革命的對立轉化。

此二章係透過小說來突顯晚清政治社會求變的事實基礎。就小